

【書評】 Book Review

DOI: 10.6163/tjeas.2013.10(2)405

丁為祥：《學術性格與思想譜系——
朱子的哲學視野及其歷史影響的發生學考察》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劉盈成
Yin-cheng LIU*

丁為祥先生在宋明理學的領域中出版過不少論著，而《學術性格與思想譜系——朱子的哲學視野及其歷史影響的發生學考察》這部大書，匯聚了他浸淫朱子學十多年的成果。二十世紀以來，朱子研究堪稱汗牛充棟。本書的寫作固然要立足於這些成就，不過更重要的是，作者緊扣著他「發生學」的關懷，透過「學術性格」之視角來論「思想譜系」的取捨與建立。這正是本書的特色所在。

本書由上下兩篇構成。上篇探討朱子其人的學術性格如何塑造了他的思想譜系：朱子早年的經歷形成了他「生存實在論」的學術性格（第一章），而此性格又推動了朱子去揀擇、詮釋北宋先儒（周、張、二程）的思想走向，終至形成了自己的哲學視野；並且將自己的哲學接上（經過他詮釋的）北宋先儒，建立一套前後脈絡相承的思想譜系（以上見第二章）。確立了自家思想、並認定自己在理學縱向繼承中的位置之後，朱子開始橫向出發，針對不同的學術主題而論難於當時的學者：張栻、陸九淵、呂祖謙、陳亮（以上見第三章）。最後，作者檢視了朱子對《四書》的注解（第四章）。無論是論難於學者、或是經書的注解，作者皆將之還

§ 丁為祥：《學術性格與思想譜系——朱子的哲學視野及其歷史影響的發生學考察》（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743頁。

Ding Weixiang, *Xueshu xingge yu sixiang puxi: Zhuzi de zhexue shiye ji qi lishi yingxiang de fashengxue kao cha*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743p.

* 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原至朱子的學術性格與思想譜系的取捨，指出這二大因素如何影響了朱子的學術活動與事業。

本書下篇探討「朱子思想」作為一個重要學派自朱子過世以後的經歷。自宋代末期以來，朱子所選擇與開拓的思想譜系，逐漸為官方與一般士人所接受，成為此後的一大學術典範。在朱學作為官方學術之大前提下，作者考察了宋末至清代幾位代表性學者對於朱子不同方向的接受與批判（第五章）。下篇甚至延伸至二十世紀，耙梳了當代三位代表人物——馮友蘭、錢穆、牟宗三的朱子研究（第六—八章）。下篇一方面勾勒出數百年間朱子學的流程與嬗變；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朱子思想的典範意義何以不只是對科舉時代有其重要性，即使到了中西交會的當代，學者仍然必須透過考察朱子以思索民族文化主體的議題。

本書第一至四章涵括了朱子哲學的各大主題，¹這些主題幾乎也都見於當代其它的專著，而本書對朱子哲學的理解，大體上也接近牟宗三、劉述先。不過作者意不在於拷貝前人的成說，而是以朱子哲學的內在邏輯為基礎，更進一步探問：朱子「其人」的哲學何以如此生成與發展？哲學理論的內在邏輯之展開，如何對應著朱子的具體生命與現實人生，又如何關聯著他所吸納的文化養分，以及對社會時事的關懷？若是只著眼於哲學理論本身的邏輯，那麼其它理學家（譬如陸九淵）接受了朱子的理路，可能也會發展出類似朱子的哲學體系。可見，只著眼於理論的內在邏輯，還不足以看出朱子哲學之中非朱子其人不能為之的特質。這就是為什麼作者尤其專注於朱子其人而試圖指出，他的家世與早年的教育環境，以及他對政治的持續關注，造就了他特有的學術性格，並且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他對思想譜系的取捨。就是這類學術主體的因素，使得朱子的哲學走向如此如此的生成與發展，並且推動了朱子與學者辯難、以及對經書的特定理解。

1 包括：朱子從學於李延平的經過、對「中和」與「未發已發」問題的思索、對北宋理學家的繼承、對小程子「涵養」與「致知」說的接受、心性論與理氣論、仁說、朱子與其它學者的辯難，以及畢生心血所聚的《四書集注》。

作者所謂的「學術性格」，要言之，乃是學者的一種長期穩定的心態與性格，亦即學術活動的主體性格。學者由此而向外投射其視野，並展開思辨架構與思想譜系的取捨。²由於朱子的生命遭遇是相對順適的，其學術性格很自然會表現於學術事業中，因此，準確掌握了朱子其人的學術主體特質，便不難追溯他哲學體系中非其人不能為之的生成歷程（頁9-11）。作者認為，朱子的學術性格可以稱為「生存實在論」：世界是人與人、人與物一體相關、共生共存的世界。在此生存基礎上，世界固然具有客觀性而可以為人所認知，但是人對它的認知乃是關乎群體之間、人物之間的一種倫理之道，而非所謂科學式的、純客觀的理解（頁81-83）。生存實在論雖然是儒、道傳統所共同認可的世界觀，但是朱子似乎特別堅持之，而使得此世界觀成為他個人明確的學術主體。

本書由此而指出：朱子對於經書文獻「求之句讀文義之間」的態度，雖遭李延平責備而不能改；朱子並非不了解李延平的「默坐澄心」，而終究走向格物致知的工夫途徑；朱子在經典中特別重視《大學》，而較不相應於《中庸》、《孟子》；朱子講究下學上達，而始終反對「發明本心」或帶有頓悟意味的為學進路；朱子嚴分理氣，強調天理的崇高與莊嚴……，舉凡這些現象或學說，作者都逐一歸結於朱子「生存實在論」的主體性格。另外，生存實在論加上儒者的現實關懷，也促使朱子堅持道德理想而持續關注與批判政治，這使得他更適於程頤（而非程顥）理氣論的思想譜系，作為政治抗衡的思想依據。

至於朱子與當時學者的辯論：與張栻辯論「仁說」時，朱子秉持宇宙論的視角來掌握「仁」，而不能理解張栻以萬物一體的道德境界為說。與陸九淵的爭論，主要是朱子主張「先博覽而後歸之約」的為學次第，陸九淵反之，於是朱子往往指責陸氏為禪、不知氣稟之雜。這兩次爭論的癥結，在於朱子的生存實在論使他排斥以心性主體來承擔道德。再者，與呂祖謙論讀經、讀史何者為重，或者針對王霸義利而交鋒於陳亮，則是因為

2 思想譜系意指：思想體系的內在結構及其展開的內在必然性。就另一面而言，思想架構若為思想家可以選擇並繼承，而且有如軌道一般畫定了他思想體系的大方向，這時又稱為「思想譜系」。（頁11）

朱子欲維護天理的嚴肅性，反對任何有流於霸術功利之虞的學問方向。要言之，這兩番論戰主要是因為，朱子的思想譜系使他過於排斥歷史上具體事理的推求，更反對現實上折衷王霸、義利的作法。——總結這四次爭論，作者指出：朱子的學術性格與思想譜系相結合，使得他先排斥心性主體的自覺、繼而抗拒來自歷史理性或具體現實的對話。結果，天理雖純粹而空洞乾枯，心性也只能格物窮理而不能作為道德自覺的主體，朱子哲學遂自絕於落實形下世界的機會。

不過，作者的目的並不在於貶抑朱子。朱子哲學誠然有其缺陷，但是他所繼承與開創的思想譜系，無論就求知方法、為學進路、立身處世而言，或作為功令所需，都頗為完備而具有典範地位。朱子學在數百年來為官方與士人所共同接受，固然足以證實其典範性。即使是朱子學之受到批判，也是以其典範地位而值得被挑戰。「生存實在論」原屬傳統中國的世界觀，朱子對思想譜系的選擇既源於此，他所發展的哲學體系自然一方面相應於傳統中國人所共有的心態與視野，另一方面，它的完備性也構成了儒學內部張力的展示場，而形成一個可以不斷受到反省與批判的思想資源。

二十世紀以來，馮友蘭《新理學》、錢穆《朱子新學案》、牟宗三《心體與性體》、劉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陳來《朱子哲學研究》等著作，都是對朱子哲學的全面研究，其重心在於思想的辨析與疏理。至於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等作，則視朱子為特定時空裡的人物，描繪他與外在政治、學術環境的交流活動。於是朱子不只是思想家，而是有豐富「活動」的思想家。而丁為祥先生之著作更進一步指出，這些具體時空裡的學術繼承、交流以及政治參與，如何形塑了朱子其人，而對「其人」的描述又追究至其學術性格與思想譜系的選擇。將哲學的發生追溯至其人，亦即讀其書而「識其人」，這當是本書在「朱子研究」領域的重要貢獻。

最後筆者想指出一點。這部著作中，作者主要是將朱子視為哲學家或思想家而論其「學術性格」與「思想譜系」。朱子確實不愧為哲學家，但

是朱子其人也包含著其它不可忽略的身份，譬如經學家。就此而言，本書固然也考察了朱子之注解《四書》，但是主要仍視之為一種哲學方面的成就。理學被視為重要的中國哲學傳統，朱子也因哲學家身份而特別受到重視，這確實是二十世紀以來反省朱子學的大方向。但是朱子還有不少作品未必能歸諸「哲學」之領域，如果把這些作品考慮進來，我們是否可能看到朱子在「生存實在論」與空洞乾枯的「天理」以外的面貌？